

要为科技人员鼓与呼

8月22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了科学技术部并做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在先后视察了科技部火炬中心和科技部机关后，与科技部司局级以上领导面对面地开了现场座谈会。克强总理在充分肯定科学技术部作为全国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在领导和组织全国科技攻关、科技创新等工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殷殷期待科学技术部还“要为科技人员鼓与呼”。

一句“要为科技人员鼓与呼”，里面包含了多少事啊！国家总理在看到我们国家近年创新奇迹的同时，心中更为挂念的是创造这个奇迹的科技人员有没有成就感，有没有获得感。2016年，中国已经有1.7亿人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其中科技工作者8100万人。8100万科技工作者，不仅有科学家、工程师，还有创新企业家、创业投资家，更有创新管理家和创新创业服务者。他们的生存状况、发展条件、现实困难等实际诉求，都应该成为“鼓与呼”的当然内涵。



“我们是谁” 幽生活一默

“我们是谁？”“财经记者！”“采访谁？”“土豪！富翁！”“你的工资有多少？”“三千五！”

“我们是谁？”“甲方！”“我们要做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现在要！”

“我们是谁？”“中国男足！”“我们的目标是？”“备战下届世界杯？”“打不进去怎么办？”“换教练！”

一组“我们是谁”的漫画占据了过去几天的微信朋友圈。对各自职业的犀利吐槽，始于一组女画家的六格漫画，经过网友的再创作，成为网络上的吐槽狂欢。有网友写道：“几乎我就在跟着小人一起呐喊，感觉很减压。”

这些漫画是网络时代特殊文化风潮的代表——红得出人意料，消失得悄无声息，其快速蹿红的背后是强大的认同感和代入感。笑人三声，不如幽己一笑，漫画经过各行各业的小伙伴“脑洞大开”的改编，被赋予更多的内涵。而人们通过阅读以及转发这组漫画，获得了情绪的宣泄。

苏联著名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笔下的“狂欢理论”，在“我们是谁”漫画的传播中找到了新的注脚。分享感受、获得欢乐与共鸣，可以说是“我们是谁”系列漫画的意义。

依托于网络的吐槽还有着无限的结成社群的可能性。在一个旁人难以即刻明白的事情上迅速达成默契，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亲密感，促进了彼此进一步了解。

不过，吐槽虽有趣，但多数网络吐槽都属于片面苛责的抖机灵，缺少客观理性的分析与建设性的建议，失之于肤浅。

《光明日报》2017.8.24 文/张焱

为科技人员鼓与呼，到底鼓什么？我认为，第一是“鼓劲”。科研人员是创新发展的主力军，我们要不断为他们的工作鼓劲加油，让他们的工作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第二是“鼓励”。科研人员在其工作中做出成绩，就要及时获得来自政府及社会的鼓励，这种“鼓励”不仅有精神上的，更要有物质上的。

第三是“鼓舞”。科研人员从事的工作对国家、对民族未来和现实都非常重要，国家的政策和措施，要真正起到鼓舞士气，鼓舞斗志，鼓舞人心的作用，所谓“人心齐，泰山移”就是这个道理。

第四是“鼓动”。科研工作是一个接力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地干，方能长盛不衰，我们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要有导向性，要让青年才俊们更多地投身到科技工作之中。

为科技人员鼓与呼，到底呼什么？我认为，第一是“呼应”。为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宽松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条件，是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义不容辞的

责任。对于科研人员不断反映的各种“行政捆绑”、“程序捆绑”、“道德捆绑”、“生活捆绑”必须积极“呼应”，给予“松绑”。各种各样的“捆绑”，不仅绑住了科研人员的手脚，也会羁绊住国家科技创新大业前进的步伐。

第二是“呼唤”。作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有责任帮助并“呼唤”相关部门，共同建立正确的人才评价准则，让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

第三是“呼吁”。对于科技部门自己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要代表科研人员不断“呼吁”。这类问题很多，如长期存在的“脑体倒挂”问题，“知识不能变现”问题，“科学家不能发财”问题。

第四是“呼喊”。作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要理直气壮地“呼喊”创新驱动主旋律，要疾言厉色地“呼喊”知识创造财富主要要素，让广大科研人员的腰杆硬起来，腰包鼓起来，头颅昂起来。

中国科技网 2017.8.22 文/房汉廷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会同财政部发布新修订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办法还特别设立了内部人员举报奖励机制：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环节内部人员举报的，可在奖励标准上追加奖励金额，同时要求各级食药监部门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泄露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重奖“吹哨人” 是打击食药违法的利器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首要的治理难题是“发现难”。不过，经营者骗得了消费者和监管者，但瞒不过企业内部员工的眼睛。食品药品企业的员工或许为了养家糊口成为违法生产线上的一员，但一旦受到外部激励，他们就可能在道德感和利益的双重驱使下勇当“吹哨人”，举报企业的不法行为。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吹哨人”制度堪称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的一个利器。建立“吹哨人”制度，重金奖励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内部员工举报企业的不法行为，往往面临着各种难以预知的风险。他们在担当“吹哨人”之前，势必要算算成本收益账。

“吹哨人”的一次举报甚至让违法者倾家荡产，他们势必对“吹哨人”恨之入骨。因此，保护举报人，不泄露举报人的相关信息，应当成为“吹哨人”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护食品药品安全，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相较于政府监管，“吹哨人”制度的触角更密、更长，成本也较低。试想，当每个食药企业的每个生产销售流程都时刻被潜在的“吹哨人”盯着，当企业经营者对身边的员工“防不胜防”，他们就不敢或没有机会干违法犯罪的勾当。

《燕赵晚报》2017.8.24 文/晏扬

中国科技繁荣中的隐忧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8月21日文章，原题：中国科技繁荣的阴暗面

中国智能手机用户已将整个世界置于其指尖下。只需轻点几下，他们就能订购食品、向朋友发送信息、寄钱、阅读新闻、打游戏、叫出租车和交纳水电气等公共事业账单。但其间也存在一种隐忧，伴随所有这些便利而至的是不菲代价：他们的自由和隐私。

今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使用微信的比例将高达79.1%。除基本通信功能外，用户还能通过微信办理登机手续、看病预约挂号和线下支付等。一位美国风投资本家曾这样描述微信，“从早到晚，它出现在你每天与世界的每一次接触中。”与此同时，阿里巴巴平均每天递送3000万个包裹，超过美国邮政史上最忙的一天。2014年，中国86%的在智能手机上进行的网购活动都是通过阿里巴巴完成。如此大规模使用网络的副产品是汹涌而至的暴露每个用户详尽信息的数据洪流。用户诸如具体地址、消费情况、工作单位甚至实时定位都在科技公司的掌握中。在保护隐私方面，中国尚不存在如何才能获取这些信息的法律及限制措施。

曾经承诺将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开放的工具和技术反而带来了我们最为担心的、反乌托邦式的现实。远非科幻的是，所有的要素均已就绪：数据库、技术、政策和先例。

《环球时报》2017.8.23 文/尤金·周

站在直播风口 农民也能“飞”起来

说到“直播”“网红”，你的第一反应，那肯定是城市靓女俊男的专利。然而，又一位太行山区农民日前借助手机和互联网直播他在田间地头播种，吸引了大量粉丝，成为“网红”。

与眼下各种直播平台的“傻白甜”相比，农民兄弟们玩直播胜在“原生态”：活蹦乱跳的农村生活与农耕文化，对于大多数城市孩子来说，陌生感催生好奇心。

农民兄弟们直播播种，醉翁之意不完全在酒，如果粉丝愿意打赏，给农民兄弟们增点收，那最好。就算没人刷“跑车”“游艇”（直播礼物），通过视频直播，将网友们带到田间地头，把农产品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等信息原汁原味呈现给大家，眼见为实，让他们放心消费，也是好事一桩。就像那位太行山区农民，“我是个种小米的……我们都习惯用当地的羊粪做底肥，化肥和除草剂

等进入不了农田”。提高生产透明度，守住农产品生产端的安全，也是“互联网+”农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事是好事，好事办实不容易，农村、农民与互联网还是有点隔阂。其中的鸿沟，需要地方政府部门或有技术、有实力的企业来填平。期待更多的农民兄弟们借助互联网平台，让人们亲眼目睹农村之美、农耕之美、收获之美。

《广州日报》2017.8.25 文/连海平

这代年轻人的购房焦虑 上代人难以理解

毕业了，工作了，挣钱了，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开始考虑买房。没想到这一考虑，让我和父亲发生了一场争论。

这场争论说来也简单，当时，我希望家人借给我一笔首付款，帮助我和女友共同置业。我的父亲却认为，与其先拿一大笔钱，再背一大笔债，去换一栋勉强能住的蜗居，不如把这笔钱用来投资，然后用投资的收益支付房租。我的父亲坚定地认为，花大价钱买房，不值当。

其实，这也怪不得我和父亲不够理解对方的想法，因为在住房问题上，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确实成长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我国的房地产政策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辈小时候，一

家人能住什么样的房子，完全取决于组织安排。后来，国家开始逐渐取消分房政策，但我们的父辈好歹赶上了房价飙涨之前的末班车，“攒钱买房”还是一件并不太难的事情。在上一代人眼中，房子的属性就是居住的地方。记得我父母结婚时，加上爷爷奶奶和叔叔，全家5口人挤在一间不到40平方米的房子里——而我的姥姥姥爷绝不会为此挑理。

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拥有这份安逸和淡定。一边是让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房价，另一边则是结婚、成家等社会压力给人带来的购房需求，夹在中间的年轻人当然有理由焦虑，当然有理由想方设法买房。

父辈的观念并非“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的想法虽然未必与我们此刻所

想相吻合，但无疑是他们人生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值得我们咀嚼与思考。

当我向父亲提出凑首付款的需求时，我想的不是“啃老”，而是想先集合家庭的力量，断绝困扰着我的“后顾之忧”。父亲的反对意见，当然也不是因为“惜财”，而是因为他的社会经验让他天然比我们年轻人更加谨慎和稳重。

我们虽然发生了争论，但最终选择了互相理解，从长计议。而这番争论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收获，我想，或许每个有计划买房的年轻人，都不妨花些时间，和父母“争论”一番。在亲情的扶持之下，或许“购房”这样沉重的话题，也能变得轻松一些。

《中国青年报》2017.8.24 文/杨鑫宇